

重新拎起了铁锤

(上接8月22日5版)

大炼钢铁

1959年春天,浙江美院课程进入到一年级下半学期,校园内仍是风起云涌。大家日夜奋战。就在校园的裱画工厂旁边,竖起了好几座土高炉,还设立了一家东风机械厂。

这样,我这个铁匠出身的人脱颖而出,承担重任,重新拎起了铁锤。

我的档案里记载着本人有四年的铁匠生涯。此时,老本行再次派上了用场。东风机械厂厂长张正恒,是个北方人,他让我做他副手。我负责打造冶炼工具,且是唯一有经验、懂技术的师傅。

和以前在萧山铁工厂不同,这次,我当了大师傅,围着高炉,不分昼夜,忙碌不辍。厂里给我配有两位助手,都是成名画家。一位是莫朴,我很早就闻其名,没想到在这种情境下相识。他给我拉风箱,充当小师傅。莫朴是我的长辈,闲来他和我聊天,讲早年在新四军的见闻。

毕竟是战争年代过来的人,经过大风大浪,莫朴虽然身处逆境,却不颓废,谈起过往,他神情豪迈,语调中还带有上海口音。从他的叙述中,我知道了更多版画家,时任上海中国画院秘书长程亚君、上海美协副主席吕蒙、和鲁迅先生合过影的陈烟桥。没想到,我到上海工作,这些从莫朴口中认识,已闻其名的画家都见到了。吕蒙还是我的同乡,永康人。

另一位下手,是我的老师潘韵。我是大师傅,莫朴是小师傅,潘韵担任中师傅。

潘老师被誉为新中国新国画的领军人物,他的山水画《春之晨》画得生机勃勃,在全国获过奖。我喜欢他的画,后来,他主动送给我一张,我非常珍爱。

潘老师是个胖子,持画笔的手,却做中师傅的活。但他性情极好,让做啥就做啥。莫朴也很配合,我真要指使他们干活并不难,但我从不。面对这两位师长和前辈,我说话礼貌客气,既考虑两位的尊严,又顾念他们的身体,千方百计让他们多休息。

那时候,工期紧,厂里要工具开工,一大群人排队等着。我们经常连轴转,昼夜加班,片刻不得休息,连吃饭的时间都被压缩。大多时候,就吃送来的两个馒头,我明显瘦了许多。有时,领导来工厂察看,见到我干劲十足的样子,感叹说:这活要是没有胡振郎,可真麻烦了!

时任浙江美院院长的潘天寿也来过一次。莫朴看见潘天寿过来,站起身来。潘天寿也站住,立在那里。潘天寿不说话,莫朴也不说话。两人彼此看着对方,互相笑笑。然后,潘天寿转身走了。我看着这一幕,颇多感慨,领悟到智者之间的交流,在思想和心灵,不一定借助语言。

累出了肺病

1959年,我作为干将,全力以赴,体能透支,伤了元气,任务完成后,松一口气,才感觉身体不适。我到校医院一检查,得了肺病。医生说是累出来的。

20世纪50年代,青霉素应用于临床,肺病不像新中国成立前那样被称为恶疾,但很多人仍谈之色变。况且,我的肺病有一定的传染性。为了清休静养,也为了避免麻烦,不让周围人担心,



胡振郎入学浙江美院不久,在兴办的东风机械厂,再次做起了铁匠师傅。

我没有和同学说出全部病情。但是,我的心理压力不小。我明白,如果不能及时治愈,耽搁了学业,可能面临劝退或者留级的窘境。

患病期间,我受到悉心照顾,校医院单独拨出一间病房给我。每天打针,青霉素和链霉素混合在一起,称青链霉素,是当时通用的消炎效果最强的针剂。

前后历时半年,过了年已经是1960年,天气暖起来,我的病情也好转。我回归到正常的学习生活。这半年,我没回家,没人知道我患病的经历。

肺病治好,我担任校劳动部副部长,继续指挥大家干活,发挥所长。我们有个小园子,做菜地,要除草、施肥、浇水、采摘,我有经验,统筹管理这些,但主要精力还是放在学业上。

成为首批学生党员

以创作教学带基础教学,是浙江美院的传统。而我,因为一直重视学习,很早就开始创作。

1959年,我创作了一幅以自己为原型的人物画《拜工人师傅为师》,描绘打铁场景,应和了当时的火热氛围。后来,我生病,创作中断,病好后继续画画。1960年,刚升入大学三年级,我创作《公社兽医》,就是后来的《兽医姑娘》,这幅画很成功,也很轰动,算我的成名作。

这时,学校来了两位老哥,比我年龄大很多,已经三四十岁。一位叫王德惠,一位叫冯白凡,都是转业军人,原来在部队是干部,有战功,爱画画,也画得好,到浙江美院来进修。这两位部队入党的老党员,认为我勤奋、踏实、刻苦、热忱,要发展我加入党组织。

当年,以学生身份入党,几乎难于登天,因为名额稀缺,很多大学,四年里连发展一个党员的机会都没有。

当然,浙江美院的竞争也激烈,同

学们都是通过高考录取而来,千军万马,能过独木桥的都是精英。大家素质都高,都有进步的要求。而且,这次发展党员,是建校以来的首次,组织上极其重视,态度严肃认真,考察苛刻。

国画系、油画系、版画系各有一个发展名额,其他系轮不到。党支部开会后,我名列其中。为了保证公平公正公开,使提名更具信服度和说服力,校门口竖起一块大木板,三个预备党员候选人名字上榜,接受群众评议,类似于现在的公示。

每个人都可以在候选人下面提意见。在批评即是帮助的宣传下,的确有人提出各种各样的意见,我的名字下面,还算相对干净。

经历了各类考察、审查和繁琐手续,在两位老哥的帮助下,我成为预备党员,预备期一年。他们两位就是我的入党介绍人。

我们这批党员,是浙江美院历史上的首批学生党员。新中国成立前没公开发展过,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是第一批。1961年,我23岁,预备党员转正,之后就一直担任国画系团支部的组织委员。

班上的事情还是我和陈家冷商量着管理。周日我们去他家,他妈妈是小学教员,人很和善。他家不大,一间20多平方米的房子。他妈妈就在阳台,用煤球炉烧年糕给我们吃。一起去的还有潘飞轮,他是潘天寿的同乡,传说还是亲戚,他自己从没炫耀过。我们常去陈家,我就鼓励潘飞轮追求陈家冷的二妹,后来居然成功了。

我、陈家冷、潘飞轮三个人关系密切,经常在一起活动,有时一起去杭州电影院看电影,这是我们为数不多的娱乐。看好电影,照例在边上吃一碗杭州面条。有时我们看晚场,散场后,总是很着急,要在宿舍关门赶回去。浙江美院管理严格,按时关门,秩序井然。迟归的同学要么跳墙,要么恳求看门大爷开门放行。我们三个从来都守纪律,不迟归,没跳过墙。

一本名家云集的签名簿

大学5年,寒暑假,我鲜少回老家。吸引我留下的是学校食堂和图书馆。一为生活便利,在学校生活,简单方便,虽然放假,也给留校生发饭菜票,有食堂,免去烧饭的麻烦。

另外是图书馆,浙江美院图书馆很大,各类书刊俱全,我平时上课,还有学生工作,非常忙碌,牺牲了很多读书时间,就利用假期进行大量集中阅读。我去图书馆,在一排排书架间逡巡,每次认真甄选,留两本书,借回宿舍看,隔两天再换两本。假期结束,补充了不少知识,特别充实。

暑假漫长,我偶尔也会短暂离开学校,去养父的干儿子那里住几天。胡关汉,是我养父的干儿子。他住象岩山,那里景色宜人,我读浙江美院之后,对于山水自然,更多一份兴趣和偏爱,爱往他家跑。

胡家背靠一片茂密幽深的林子,往北一座山,以我的步程,40分钟能到山顶。山顶有古洞,古洞洞口朝南,冬暖夏凉,即使在炎夏季节,往洞口一站也是舒适宜人。好几次,关汉哥给我安排一张床,我便住在里面。夏天非常风凉,洞内有山泉,下面放一口缸,喝水、泡茶都用里面的水。

回学校后,有时也会与同学讲起夜宿山顶的事情,大家都觉得我胆子大。其实,他们哪里知道,我早前的经历,已足以锻炼一个人的胆量和灵魂。对我来说,半夜山风吹过,夜空浩瀚深邃,繁星密布,清晨旭日初升,近闻泉水奏鸣,远望山峦青黛,焉能不陶陶然、熏熏然,恍若仙境。

我和胡关汉投缘,遂结拜成兄弟。他与我阿哥也交好起来,每年去我阿哥家拜年,从不懈怠,两家人走得很亲近。

在胡家,每次都吃胡关汉母亲做的饭。胡家有个女儿,爱如明珠,叫胡杏花。胡杏花到十岁还没读书。有次我回去,说起这个话题,我催促她去读书。我毕业那年,这位老母亲说,要把杏花嫁给我,我没答应,他们此后就不再提了,大家依然亲密无间。后来读了几年书的胡杏花,如今住着大房子,家里人丁兴旺,几个儿子都有出息。

我另一项爱好是逛旧书店。旧书便宜,有时还是孤本,其他书店买不到。新书贵,也没必要买,图书馆基本都有。在旧书店,我买到过《说文解字》《康熙字典》《古今医统大全》等,都是线装书。

最大的收获是买到一本贵宾签名簿。过去大户人家请客,有签名留念的习惯,这本签名簿幅面多,制作精美。它后来变得非常贵重,由当初的几元钱,最后变成我的无价之宝。因为我后来到上海美协工作,还借调到过上海中国画院,认识和交好的知名画家不胜枚举。我就用这本签名簿,请他们画画,留作纪念。先后在簿子上留名的,有林风眠、刘海粟、谢稚柳。这个簿子简直成了新中国成立前后海派画家的作品集成。

好多次有人愿以各种代价,要购买这本签名簿上的画,有的甚至说用一幢别墅换取,但我从未动心。因为这本册页的每一页上,每一幅作品,都留存着时代的情感,体现着艺术大家对我的关爱。看着有振郎同志的落款,我会想起历历往事,心潮难以平静。如今,很多前辈已驾鹤仙去,这本册页更成为一件珍贵载体,承载着我的思念和感情。

胡振郎 口述 邢建榕 魏松岩 撰稿